

探寻徐州最早的书院——徐州路书院

书院是一座城市最显著的文化名片之一，突显当地的文化特色，承载当地的文化底蕴，一些地方甚至不知其名，但是却知道其书院，可见其影响力之深远。如耳熟能详的东林书院，也就是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，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”的东林党人阅读之所，可是鲜有人知该书院是建在明代的无锡。

徐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，历史上是不是也建有过书院？如果说今天的云龙书院是徐州的最早书院显然有些欠缺，因为徐州书院历史只能追溯到明朝，那之前有没有书院已无据可查，历史上徐州最早的书院是何时建立的呢？

书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，是中国古代王朝重要的文化坐标，为教育、学术、文化、出版、藏书等事业的发展，对民俗风情的培植，国民思维习惯、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，是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、信仰传承的标识。

从书院发展情况来看，相关资料表明，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，起源于唐玄宗时期洛阳紫微城的官办丽正书院。该书院兼具藏书、修书功能，开元十三年改称集贤殿书院，其间长安亦设有同名机构。

宋代形成正式教育制度，朱熹等学者推动书院发展，由富商、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处建学舍，设置学田维持经费，分官办、私立两类。南宋理学兴起推动书院制度化发展，形成应天书院、岳麓书院、白鹿洞书院、嵩阳书院四大书院体系，另有石鼓书院、鹅湖书院等著名学府。

元朝书院制度更为兴盛，专讲程朱之学，并供祀两宋理学家，向边陲和发达省份的穷野之地传播，这标志着其发展进入了成熟的推广、繁荣阶段。

清代官方强力进行书院建设，各级官办书院成为全国各地大小不等的学术教育中心，面对随大炮战舰冲入国门的西方文化，书院努力应对，将西学、新学引入其中，终于形成了新式书院。民国前期，现代书院陆续涌现，其创办宗旨多为补新式教育之不足。而在抗战烽火中，新儒家更赋予书院救民族于危亡的时代使命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始，一大批以复兴国学为己任的现代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，呈现生机勃勃之势。

徐州在明朝以前并未有书院的说法。目前有据可查的要数《徐州志》明确记载：云龙书院等著名书院均建于清代，最早为清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。

带着这一疑问，笔者探寻了许多名胜及史料，发现徐州龟山民俗博物馆有一件青花八棱梅瓶，铭文：“徐州路书院李文华喜捐梅瓶一对供奉石佛寺佛前至正十年九月谨记”。据《徐州古方志》记载“元代徐州路行政建制变化频繁：至正八年（1348）升徐州为总管府，称‘徐州路’，至正十二年（1352）降为武安州，属归德府。”而且兴化寺在元代被称为“石佛寺”，正好与此瓶记载相符合。

那么元代到底有没有徐州路书院呢？综合现有史料，元代至正十年徐州



青花八棱梅瓶

路范围内，没有可靠文献记载存在任何书院。徐州地区的书院教育体系主要形成于明清。从目前史志有明确记载的徐州最早的书院设立于明代，现存最早地方志未提元代书院：明正統《彭城志》仅提及元代“在东南隅”设学校，但未列出具体书院名称，且强调“旧志云：徐州历代学校之设莫可考”。据此“东南隅有学校”来判定，其唯一对应的学校应与“徐州路书院”相关。如果没有“徐州路书院”，何来此瓶？

由此可见，元代徐州是有“徐州路书院”的，因为“东南隅有学校”是真实存在的，至于这个学校是什么名字，具体信息有待资深专家考证。总之，它是一件信息量非常丰富、历史、文化价值巨大的载体，尤其对于徐州文化脉络的接续将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。

从文物上铭文“徐州路书院李文华喜捐梅瓶一对供奉石佛寺佛前”来看，史料记载：书院管理制度受禅宗丛林影响极深，机构上设山长总揽事务，官办书院由地方官礼聘山长，私立书院自聘后报备官署，堂长协助管理，副

讲负责教学，斋长维持纪律。从功能上看，书院和寺院性质相似，均是以教育生徒为特征，以传道授“业”为目的，是具有自发性的教育组织。丛林为禅宗佛教徒潜心求道之所，而书院在理学家的精心经营下，也成为传承儒家“道统”的场所。士子在幽静偏远之寺院静心读书已经形成传统，这对书院选址很有启发，明正統《彭城志》仅提宋代书院便多建于风景秀丽之名山。石佛寺地处徐州古城西南，依云龙山而建，文物上所记的“徐州路书院李文华喜捐梅瓶一对供奉石佛寺佛前”的说法应为一一致。

元代书院填补辽金两代留下的空白，呈现向北推广之势。这时书院出现官学化趋势，徐州作为南北要冲建立书院成为必然，由于元代徐州路行政建制升徐州为总管府（称“徐州路”）仅4年，所以这一时期，书院称为“徐州路书院”与行政建制一致。

书院迈越古今千年依然呈现出蓬勃生机，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为出发点，支撑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文化事业。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时，又以开放之势接纳西方学校制度与先进的科技知识，成为连接古代与近现代教育的桥梁，几乎独立承担起贯通中国教育血脉的重任。今天我们要以文化的自觉、自信与担当，与时俱进，由古开新，如此始能传承书院积累、研究、创新与传播文化的永续活力。

吴惠芳文/供图
(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)



瓶身上的铭文。

大同街上这处老地标，最初叫钟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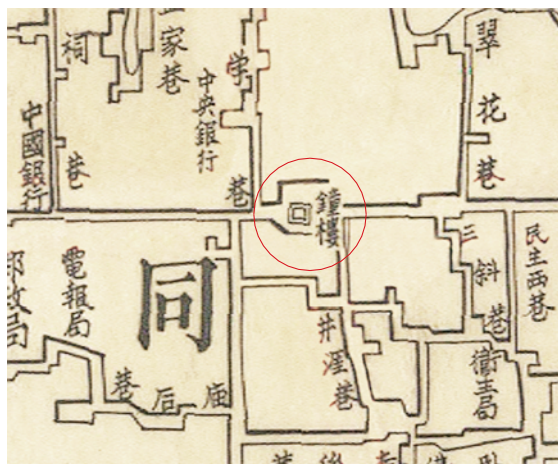
大同街钟鼓楼在徐州是个家喻户晓的地标老建筑。

从上世纪30年代初建成至今，这座建筑见证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苦难，见证了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宏伟，更见证了改革开放至今徐州城市和人们生活的日新月异，依旧岿然耸立。钟鼓楼这个名字，很多人已经习以为常，1987年作为市级文保单位，碑刻上的名称使用的也是钟鼓楼。

不过，在建成时它的名称只是钟楼，这个名称在当时的杂志、报纸、地图上都有明确标注。

关于钟楼的建筑特色有很多文章介绍，这里不作赘述。这里只谈它的名称和建成时间，因为网络上有很多以讹传讹的说法。

1934年出版的《徐州游览指南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钟楼位于大同街中市。计高五层，完全以青砖建成。于民国二十二年秋兴筑，翌年春始竣工。”这个记载清晰地表明，这座建筑的名字是钟楼，1933年秋兴建，1934年春竣工。记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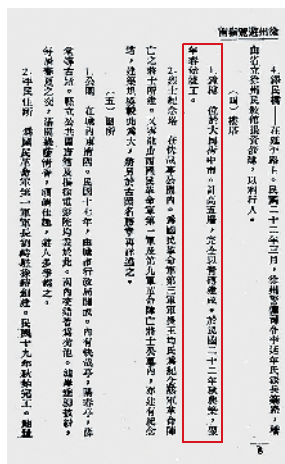
1934年版的《铜山县城市图》中，大同街上该位置标注的建筑名称是钟楼。

出自钟楼建成当年所发行的书中，对于刚刚发生的大事，《徐州游览指南》作者搞错名称和时间的可能性几乎没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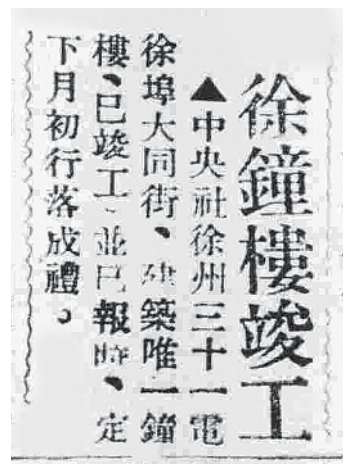
同时，1934年2月1日的报纸（《中央日报》）以《徐钟楼竣工》为题，刊登了一则短消息：徐州三十一电 徐埠

大同街建筑唯一钟楼已竣工，并已报时，定下月初行落成礼。这条新闻也佐证了1934年版《徐州游览指南》中的记载，它在建成之时的名称是钟楼，建成时间是1934年。

此外，在1934年版的《铜山县城市



1934年版《徐州游览指南》中对钟楼的记载。



1934年2月1日报纸上刊登徐州钟楼竣工的消息。

图》中，在大同街上该位置标注的名称就是钟楼。

究竟钟楼的名称为何后来变成了钟鼓楼，原因不得而知。至于鼓楼，那是徐州另一座有故事的历史建筑了。

萧泉文/供图